

〈論說〉

交流与碰撞

——论晚清民初报刊中的日本因素

王 雪 驹

摘要：近代以来，中国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外交均受到日本的巨大影响，除指涉重大议题的影响之外，中国近代新闻学的确立与发展也受到了日本因素的影响。在时局之动荡发展与中日关系转变离合的背景下，通过中国留日知识分子与学生群体的引介，中国在一些新闻观念、新闻理论、新闻教育、新闻实践上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日本的影响。在中日双方的交流与碰撞中，一些从日本舶来新闻观念，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影响了晚清民初中国的新闻教育与业务实践。

晚清以将，西力冲击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，体现西方物质文明的交通、市政、文娱、生活方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传统中国社会的单一封闭局面被打破，西方文明引入中国社会后，引起诸多新旧秩序的冲突与对立，这构成了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景象。在此历程中，“西风东渐”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调和主流。伴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与戊戌变法的历史时刻的展开，“与‘洋’有关的人和物在社会上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”¹。与此同时，清廷陆续派遣驻外使节、技术专家和留学生出洋。行至晚清，已有更多的国人踊跃走出国门，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。

1 苏生文：《晚清以将：西力冲击下的社会变迁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7年，第205页。

所谓间接接触西方文明，指的是从指定“脱亚入欧”为目标的日本身上，汲取西学营养，学习西方文明模式。

在接触、学习西方文明模式的潮流中，晚清时期以报刊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工具成为了解西方文化、物质文明的重要窗口，各色新式报刊的涌现，组建了一副庞大的信息网络，以上海、天津等大城市为中心向周边乃至全国辐射。更使人惊奇的是，新式报刊是传输西方文明的窗口之外，其本身也成为“西风东渐”的受益者，如指涉新闻观念、新闻实践的诸多话语、思想和实践，就与地处东方的日本有莫大的牵连。甲午战后，众多的中国留学生、保皇派、革命派齐聚东瀛，开展报刊实践、引介新闻观念，无一不体现了近代中国新闻观念的推进与日本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为此，本文试着提出并解决以下问题：在近代中国，尤其是甲午战后，国人新闻观念的引进和新闻实践的展开，与日本有何关联？其中的日本因素发生了何种作用？中国方面有何反应？

一、从了解、猎奇到看重：国人眼中的日本新报

近代中国近代报刊的成立与发展过程中，曾流传影响到日本，被制成官版翻印报纸，也有一些非官版的报纸²。鸦片战争后，清廷采取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策略，洋务运动使中国在器物上又优于日本，此时中国对处于朝贡体系的日本并不在意。中国报刊上对日本的介绍，多侧重于一些风土人情，以及陆续有与欧美相关的日本新闻出现。较早的《六合丛谈》中，关于日本最早的记录应是对美国黑船来航的记载，“合众与日本合议既成，乃立通商条约，以垂永久”³。

《申报》创刊初期对日本着墨不多，多是刊登“东洋店”“东洋号”的日

2 （日）平井隆太郎：《珍贵的研究成果》，（新加坡）卓南生：《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：1815-1874》（增订新版）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5年，日文版原序，第41-44页。

3 《日本近事》，《六合丛谈》第1卷第12期，1857年，第11页。

商广告或是欧美各国与日本打交道的一些外交事件。即对日本的介绍，侧重于商业和一般性的政治事件，日本是作为清廷和欧美各国的外交陪衬而出现。如此情况下，涉及日本新闻报刊情况的介绍就极为难得少见。所见《申报》关于日本新闻界的介绍，至1875年12月14日方才出现，题为《闺阁日报》：

“天下之事愈出而愈新，自有新聞報以來，各國皆仿行創設，幾於目不暇觀。某教師倡為小孩月報為蒙童說法，尚已近聞日本東京創一日報館專供婦女觀覽，不數日間已風行，遠近爭買以觀，人謂東人之好尚不同他國，然以是事觀之，則日本婦女之好學，殆亦蒸蒸日上矣”⁴。

消息简短而意蕴明显，日本新报中有专供妇女观览的《闺阁日报》，这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举措有关，引介西学，灌输新式知识，面向特殊群体做知识普及与教化。但《申报》报道口吻以猎奇态度出现，“天下之事愈出而愈新”，作为最早接触西学的沿海士大夫的《申报》诸君，以新奇眼光看待日本面向独特受众开办的《闺阁日报》，实际上也暗示“洋务运动”中对器物的学习最终流于表面，民智未开，文明的传入与彻底接受尚待时日，本质上表现了彼时中国对新式事物的某种抗拒。

随着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推进，日本奉行全面西化的国家政策，流俗所及，日本的诸多举措吸引了中国的目光。在中国内地新报流行之前，1872年，《中西闻见录》中记载：“近闻日本东京印造新闻纸，日出一本，略如京报，内载民间事实，各国交涉事件，以及士儒论风辩俗博闻广见之文，其于国政民风深有裨益，即如市井之民裸露身体原所不禁，今经士儒于新闻纸上斥其非礼，遂得传播上闻，深为嘉纳，现已出示，明禁该民不得仍前袒露，犯者有罚，因思中华文物之邦，京师首善之地，而大市通衢，乃有不顾廉耻之辈，赤身露体，厕于路旁，大邦君子，何弗一斥责之，使无耻者有所忌惮矣”⁵。实际上在强调新报的移风易俗、文明开化，提高国民素质的社会作用，这或可表明，新报进入中国伊始，创办者就暗含承载着文明开化的功用和期

4 《闺阁日报》，《申报》，1874年12月14日，2版。

5 《日本近事·东京新报》，《中西闻见录》第2期，1872年9月，第13-14页。

待，而日本新报中所包含的诸多移风易俗的功能，被国人有意引介和放大。

紧随着日本侵占琉球与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摩擦，中日关系成为清廷对外关系的敏感点。政治上的深入接触，也使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新兴面貌引起了中国报刊的极大兴趣。日本效法学习西方的众多举措中，围绕着新报的一些举动，逐渐成为众多中国新报的报道内容。如，《万国公报》就充斥着与日本新政相关的商业、政治、经济的大量介绍内容，这其中也包括对日本新报的诸多新闻报道。1874年，《万国公报》“大日本国事”中记载日本“广设新报馆”：“本馆主人四年前游历东洋该国，新改西式甫创，规模诸多草率，从未有所谓新报者，近来长崎横滨兵库大阪等口皆设新报馆矣，据西字新报云，东京一处所行新报已开三十八馆，可谓今胜于昔也”⁶。

1875年，《万国公报》还记载了在中国发行的日本新报的一些情况：“东洋字之新报在中国各口岸并京城共有三十四处，计由信局所发，一年中有二百五十六万四千二百二十九。又有一报馆名日日报，计由信局发出，亦在一年之中九十七万四千七百四十三张之数”⁷。后续又发表《乃日本新报之盛》，简短介绍了日本新报中的日报：“前次报中曾论日本国新报逾开逾多之事，今见东京有一报馆系东洋字者，一日一出，各曰逐日报，据说每日售有一万五千张”⁸。彼时，1895年以前的中国内地新报数量不多，日本已经开始刊出日报，且销量可观。晚清时期新报的发行实际上是一个受到限制的问题，这导致读报成为颇为罕见的行为，报刊数量少、交通条件不便均称为限制阅读新报的因素。

以故中国报刊感叹“近年来，日本人学西国法殚心竭虑，不厌精详，故一切事俱蒸蒸日上也。即如电报一事，亦欲由京城作起。按日本人学习西国诸法后于华人，而华人所学者究不若日本人勇往无前，是以何故？”⁹尤为注意的是，日本明治维新后，民间还自发形成了小型的新闻团体，以“教论人

6 《广设新报馆》，《万国公报》第317卷，1874年12月26日，第19页。

7 《新报数多》，《万国公报》第327卷，1875年3月13日，第14页。

8 《乃日本新报之盛》，《万国公报》第321卷，1875年1月23日，第28页。

9 《日本国作电报》，《中国教会新报》第138卷，1871年5月28日，第189-190页。

民”。《万国公报》记载，“茨本县第九大区副区长野田某等五十五人，共结一会曰明达，聘士族某，讲说新闻纸，以教论人民”¹⁰。

以上迹象或可表明，此时期的近代报刊或者说新报，国人对其功能的认识处于初级阶段。新报往往都会刊登京报的一些信息，如《申报》就有“京报全录”。照此看来，京报和新报除却具有一种内容的连续性之外，后者对于前者更构成了一种信息的“替代”。国人眼中的新报的功能，基本是彰显“上下通”“中外通”的功能，即内容多紧扣帝制时代的政治生活，在商言商不是最主要的关注点。如此，相较之下，中国新报上对日本新报的介绍，不乏对其文明开化、政治清议等现代性因素的赞叹和艳羨。这或许表明，正是最初的新报，由于承载着京报的一些“上下通”的功能，这种对替代邸报功能的追求，影响着国人对新报的认知，从而基于京报的功能来理解新报。这从侧面证明新报一定程度上仍处在“帝制”的樊笼之中，缺乏较多的现代性因素。

二、日本新报与晚清政治生活

戊戌变法前后，晚清报刊中对于日本的介绍内容，不仅从数量上呈猛增势头，且许多报刊积极主动的引介、日文报刊内容，以补己所需，日本新报的内容、形式、做法成为中国报刊借鉴的对象。其实，新报本身构成一个信息世界，加之大量吸收外国报刊的信息，使之自身的的信息世界进一步拓展，1896年，《时务报》创刊，设有“域外报译”，“既有译者自备，又有报馆出面借用或订购。大约采用了近四十种英文报，出版地包括英国、美国、日本、朝鲜和中国本土；三十种左右的日本报，九种法文报，七种俄文报和四种西班牙语报”¹¹。后来的《东方杂志》更是积极接受外来稿件“本杂志略仿日本《太阳报》，英美两国而利费 Review of Review 体裁，除本社撰译论说、

10 《宣讲新闻会》，《万国公报》421期，1877年1月6日，第21页。

11 廖梅：《汪康年：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85页。

广辑新闻外，并选录各种官民月报、旬报、七日报、双日报、每日报名论要件”¹²。

借助日本新报内容的做法，与当时中国新报数量少，种类不全的办报现实有关。如《申报》即直言不讳地指出，中国沿海港口及一些内陆城市，“各有日报馆设风行海内，亦既粲然可观矣，以视欧洲各国，则殊不及也”，而“即以日本区区一岛而论，其所设各报亦多至二百余种，中国年来虽风会日辟日报之外，益以旬报邹生小儒皆能知五洲之情万国之事矣。然犹寥寥不过数处，与海外各国相较，不犹有小巫大巫之分耶”¹³。

除日本新报能作为晚清报刊信息世界的补充之外，在报刊的功能上，西方报刊（其中就包括以西为法的日本新报）也呈现出了迥异的政治旨趣和专业水准。同样出自《申报》的《与西友论报纸体例》一文，指出西方报刊的新闻职业精神所在，“夫报馆采访时事必须准确而议论又必持平，不可诋语怨言妄腾口说；故西人之视报纸也甚重，朝出一纸见者响应”，“且泰西之为馆中主笔者，或魁儒硕彦或退位大员，能周知时事之是非，考察新理之所得，详为纪载，以备濯磨。从无有列论近事，信口以谈毁誉第，凭其恩怨而借报馆为讹诈地者，中国则不然”，“中国则以报为诈骗钱财之具”、“谋利之券”，“是以为报而谓有益于国政，能开乎民智，谁其信哉？是故中国之报纸，仿自西实则违乎泰西之意，不特与民生国计毫无所补，其不为西人所窃笑者几稀矣”¹⁴。

其实，新报在晚清随着传教士与商人进入中国内地之初，先是展现了一定的“商业化”特征，但国人对于新报功能的“上下通”的初步认知，表明身处帝制樊笼中的新报，并未有条件展现过多的某种“现代性”，也就一直没有发挥在政治上结构性的影响力，其近代报刊的专业性和政治性就大打折扣。变化发生在1895年以后，“新式传播工具在1895年以后的政治化”，让

12 《新出〈东方杂志〉简要章程》，《东方杂志》第1卷第1号，1904年3月11日，第1-2页。

13 《与西友论报纸体例》，《申报》，1897年10月17日，1版。

14 《与西友论报纸体例》，《申报》，1897年10月17日，1版。

中国知识群体主动利用此工具，撼动了原有的政治与社会秩序¹⁵。也就是说，对新报的定位，开始突破原有的“上下通”“中外通”的功能认知，试着摆脱京报的影响，朝着议政的方向迈进。

基于此，报纸的定位要成为“清议”的代表，其实，这种态度也是言政的古老中国传统的现代呈现。也就是说，报刊务必与富国强兵相关联，才能赢得士人的重视。所以，报刊本身需要学习西方，其中的对象，必然包括明治维新后的日本，尤其甲午战后，此一趋势愈发明显。这是甲午一役中国败于日本后，基于对西方经验的了解和效仿。1896年，宋恕《代陈侍御请广学校折》中表示“今宜诏求英、德、法、美、日本等国议院、报馆详细章程，征海内通人斟酌妥善，与学校同时进行。”¹⁶这其中就有日本的因素。

具体来看，报刊要紧密结合时事，为变法改革发挥舆论影响力。典型的代表是梁启超在《时务报》的《论报馆有益于国事》，定位报刊的功能是“去塞求通，厥道非一，而报馆其导端也”，他期望以报刊为工具，使“风气渐开，百废渐举，国体渐立，人才渐出”¹⁷，即借助报刊开拓风气，培养人才，助推改革运动。这与国人自办新报的初衷已经显出区别，王韬创办《循环日报》，更多地出于和西人争夺舆论主导权的主动迎战，“是香港报业先驱者对西人引介和操纵下的‘新报’的不满和反弹”¹⁸，而那时报刊的功能基本限于“上下通”“中外通”的定位之中。甲午战后，新报开始展现诸多政治功能，且开始试着从与京报内容的连续性或基本模式中突破出来。《中外新报》就认为邸抄和京报，“不过朝廷之谕旨，大臣之对章，无舆论也，无民情也”，断定“甲午以前，固无报也”¹⁹。

《时务报》第一册有“谕旨公录”“奏折录要”等一些内容，但这并非是

15 李仁渊：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：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》，台北：稻乡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103页。

16 宋恕：《代陈侍御请广学校折》，《宋恕集》上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3年，第247页。

17 梁启超：《论报馆有益于国事》，《时务报》第1册，1896年8月9日，第1-2页。

18 （新加坡）卓南生：《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：1815-1874》（增订新版）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5年，自序第8页。

19 《论中国宜注意下流社会》，《中外日报》，1902年10月31日，第6-7页。

对京报模式的彻底继承，反倒是照顾士子的阅读需求与关心京城时事的政治考量。《时务报》第18册开始停止刊登谕旨，但遭到一些读者的反对，才自第35册起，重刊谕旨，但这不是报刊的主要内容，“论说”“近事”“西国政事”，以及译介欧美与日本的近代化事宜。

如上所说，这其实表明了一种新的趋向——甲午战后，报刊开始突破帝制的窠臼，成为书生报国的发言渠道，积极地介入到晚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之中。但不论是汲取日本、西方的新闻专业精神和古代中国的书生论政传统，因帝制时代从上到下的政治治理方式未曾改变，书生的诸多努力，也是徒劳而已。

三、留日群体与新闻观念的舶来

清末民初，基于“考察日本致强之因，在于善于吸取西洋文化所致，于是朝野上下同感通过日本学习西洋文化，是中国的最佳出路”²⁰这一认识，在官方的大力鼓励之下，日本因其“路近、费省、文同”等诸多便利，成为留学的热门选地。自1896年，清廷驻日公使裕庚招募13名学生东赴日本，中国近代留日运动由此开端。戊戌变法前夕，御史杨深秀就上奏《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》，视出洋留学为实行新政之必要途径，而留学日本最应提倡²¹。甲午战后，对待清朝留学生，日本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的支持政策²²。自此，许多有识之士为寻找新的出路，纷纷负笈东瀛，日本成为当时的留学热门之地。留日学生的群体中，成分复杂，其中包括时髦学生、激进的革命者、忠于清廷的官绅，和一些政治流亡者等等。有学者称之为清末民初的留日热，

20 王奇生：《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：1872-1949》，武汉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92-93页。

21 荣应英：《戊戌维新与清末日本留学政策的成立》，王晓秋主编：《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——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》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322页。

22 宋志勇，田庆立：《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》，北京：世界知识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66页。

是100多年来的中国留学史上的第一次留学热²³。相较于中国，此时的日本是“新知识的聚散地、活动家们会师检阅的地方”²⁴，而清末民初留日生与诸多政治流亡者在日本的报刊实践活动，推介了一些新闻观念，带动了国内的新闻实践的深入开展。

戊戌变法失败后，梁启超流亡日本，接触了新思想，“脑质为之改易。思想言论，与前者若出两人”²⁵，思想的转换投射在他办报的思路与言论之上。梁氏创办《清议报》，揭橥“清议”旗帜，要成为“为国民之耳目，作维新之喉舌”的耳目喉舌的舆论工具，有学者将之称为一种“公论”²⁶，这其实表明晚清政治立场的转变在报刊上面的投射——即报刊开始脱离党派的樊笼，向代表国民“公意”发展。从《时务报》至《清议报》，再至后来的《新民丛报》，梁启超逐渐跳出报纸属于某一派别的束缚，从党派的喉舌，向“国报”即“国家的喉舌”进发。后来，梁启超在《敬告我同业诸君》中，更明确表达报馆的独立地位，以期实现“报馆则代表国民发表公意以为公言也”²⁷的目的。“戊戌维新之后出现的报章——尤其是在日本出现的诸多报章，所展现的‘色彩’却大相径庭”²⁸。这一切在表明，国人对报刊的认知，开始摆脱“党派私有”的认知，萌生了作为社会公器、国家诤友的舆论工具的报刊功能意识。后来梁启超进一步发展他的报刊舆论观，认为报馆能创造舆论，“夫舆论之所自出，虽不一途，而报馆则其造之之机关之最有力者也”²⁹，而

23 王奇生：《留学与救国——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》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7页。

24 严安生著，陈言译：《灵台无计逃神矢——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》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2018年，第49页。

25 梁启超：《夏威夷游记》，《饮冰室合集》专集之二十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9年，第186页。

26 章清：《清季民国时期的“思想界”——新型传播媒介的浮现与读书人新的生活形态》（上）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203页。

27 梁启超：《敬告我同业诸君》，《新民丛报》第17号，1902年10月2日，第3页。

28 章清：《清季民国时期的“思想界”——新型传播媒介的浮现与读书人新的生活形态》（上）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211页。

29 梁启超：《〈国风报〉叙例》，引李秀云：《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151页。

“梁启超以横滨为据点所进行的那些振聋发聩的言论活动，在国内普通知识人中间广为流播”³⁰。

留日学生群体在日本创办了大量的报刊，很多以省籍学生为群体创办，如《浙江潮》《江苏》《新广东》《湖北学生界》等，其中一些明确表示出舆论、“公意”的意蕴，甚至更为直接表达了报刊所具有的舆论之权。1900年的《开智录》，开篇即谈到：

“呜呼！新闻纸之权力大矣，责任重矣。不爵而贵，不位而权，主持风化，掌握褒贬，孰有过于新闻纸者哉！虽然此非报馆一家之私论，记者一人之私言所能也。盖记者不过代国民宣言，以鸣其不平耳！故代表国民之智慧，以企增人类之幸福，此新闻纸之大目的欤！”³¹。

这篇文章谈到了报刊应作为代表“公论”的舆论权，这也证明了晚清以来对报刊功能论述的转向。1901年秦力山在东京创办《国民报》，指出该报的宗旨要做到“毋取空琐，毋蹈偏私”³²，表达了对报刊舆论的重视，已经显示出公共舆论的意味。

国人在日创办报刊在国内的盛行流布，成为晚清民国时期的一大社会景观。《清议报》在日本创办，但在国内设有代售处，且与一些报刊形成互为代发的机制。报纸流通于国内，使读者的阅读接受成为可能。《清议报》士人竞相阅读，清廷屡禁不止。张桐谈到“然此书（戊戌政变记）刊自东洋，与《清议报》同，禁者禁，而行者仍行，盖中国之无权也久矣”³³；英敛之夜读《清议报》，“灯下阅《清议报》，竟夜未睡，直至天明”³⁴。当时读书人留存的阅读记录里《清议报》成为屡见不鲜的名词，而继《清议报》之后的《新民丛报》，更是盛极一时。《时报》《申报》还为《新民丛报》作鼓噪和广

30 严安生著，陈言译：《灵台无计逃神矢——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》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2018年，第49页。

31 《开智会录缘起》，《开智录》“改良第一期”，1900年12月21日，第2-3页。

32 《倡办〈国民报〉简明章程》，《国民报》第1卷第1期，1901年5月10日，第1页。

33 俞雄选编：《张桐日记》，光绪廿六年八月廿六日，上海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58页。

34 方豪编录：《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》，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，引沈云龙主编：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》第3辑（21），台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74年，第277页。

告宣传，当时涉及《新民丛报》的阅读记录更是屡见不鲜。

报馆之间的代购代发、报刊之间的互相推介、读者之间的互相借阅，成为国人在日本所办报刊流通于国内的渠道。“由于留日学生数量众多，在中日之间形成了书刊流通的统一市场，到日本留学的学生有阅读国内报章的需求，而在日本创办的报章更以直接发行到国内为诉求³⁵。彼时，如林语堂所说，“在日本出版的新闻刊物的影响力日趋强大，尽管官方下令查禁，但这些报刊依然以独特的方式到达中国的学生阶层”³⁶。这些报刊影响到了大批寻求出路、趋新的读书人，如，《苏报》就经常刊登留日学生报刊的一些内容和动态，积极地向国内新闻界和读者做宣传推广，这些报刊组成的媒介网络，极具舆论动员的作用。正如有学者观察到维新派依托近代媒体，形成南北相呼应的舆论动员³⁷，中日之间的新闻联络也具有相同的含义。由此，像《清议报》《新民丛报》以及留学生报刊的言论，引起了清廷的恐慌，从而被列入“悖逆”书报之列，这反倒印证了这些报刊在国内流布盛行的程度。也就是说，国人在日本所办之报刊，通过各种方式，在国内能够顺利的接受和阅读，这保证了中日之间新闻观念、新闻实践的相互交流和碰撞。

除此之外，晚清民国时期，甫一起步的新闻学学术研究，也与日本有重大关系。有学者统计，自近代以来，从事新闻学研究的留学生共有44人，其中留学日本有17人，占38.64%³⁸，日本的新闻理论成为中国新闻学最主要的理论来源之一³⁹。一些留日学生的代表人物，如邵飘萍、任白涛等，归国之后，从事新闻教育或新闻实践活动，对先进新闻观念和新闻业务实践技巧的引进，尤其是新闻理论的推介起了领军的作用。1914年，邵飘萍在日本求学时，就与同学组织“东京通讯社”，向国内报刊供稿。1920年，他第二

35 章清：《清季民国时期的“思想界”——新型传播媒介的浮现与读书人新的生活形态》（上）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219页。

36 林语堂：《中国新闻舆论史》，王海，何洪亮译，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90页。

37 王天根：《南北媒介网络与清末政治舆论的动员》，第382-396页。

38 李秀云：《留学生与中国新闻学》，天津：南开大学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250页。

39 李秀云：《留学生与中国新闻学》，天津：南开大学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252页。

次避祸日本期间，任《朝日新闻》的特约记者，期间考察日本新闻事业，到日本新闻学会听课，对日本新闻学有了全面深刻的理解。邵飘萍后来出版的《实际应用新闻学》，和他在日本的学习、考察与新闻实践，不无关系；任白涛的《应用新闻学》，就是在日本新闻学术研究的成果，他在本书中尤其关注“舆论”的作用。而邵、任二人，均提出了与“新闻记者是‘社会第三者’”⁴⁰相关的一些论述。

余论

187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报刊中对日本新报的介绍，《申报》充满了猎奇的心理；日本明治维新后，其国家面貌和国力的飞跃，使得有关新政方面新闻举措的介绍，开始见于中国近代报刊之上，这其中对日本新闻界的情况经历了了解、猎奇，到介绍、重视的过程。维新运动前后，日本新报的内容被广泛引进到中国，构成了中国近代报刊信息世界的极大补充，其指涉报刊功能的一些观念也被吸收引进；甲午战后，政治流亡者与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的报刊，对报刊功能的论述有了进一步发展，进而影响到对国内报刊功能的认识，甚至影响到政治局势和社会变迁，戈公振就感叹晚清时期报纸精神胜于民国初年⁴¹。行至民国初年，报刊市场已较为发达，“今国中报馆之发达，一日千里，即以京师论，已逾百家，回想十八年前《中外公报》沿门乞阅时代，殆如隔世；崇论闳议，家喻户晓，岂复鄙人所能望其肩背”⁴²，进入民国后的舆论环境，已经发生巨大改变，报刊随着政治局势沉浮而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。

其实，晚清民国的中国正处于“转型年代”，如学者观察，“1895年至1925年前后大约25年时间，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年代，

40 李秀云：《留学生与中国新闻学》，天津：南开大学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134页。

41 戈公振：《中国报学史》，北京：中国新闻出版社，1985年，161页。

42 梁启超：《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与将来》，《庸言》第1卷第1号，1912年12月1日，第4-5页。

主要变化有二：一是报纸杂志、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，一是新的社群媒体——知识阶层的出现”⁴³。处于“转型时代”的中国近代报刊，尤其是在戊戌变法之后，其受到日本因素的影响颇大。指涉这一话题，意在指出在中日两国报刊的交流、碰撞、流布中，为中国近代报刊观念推进、功能的定位，而展开更为丰富的图景，借以探求日本因素在中国近代报刊中、乃至晚清民初言论界、社会中所起的某种潜力作用。

43 张灏：《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》，《二十一世纪》总第52期，1999年4月，第29-39页。

引章清：《清季民国时期的“思想界”——新型传播媒介的浮现与读书人新的生活形态》（上）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37页。